

# 蒋介石 1928 年统一前后政治运筹评议

郑 率

(吉林大学 文学院历史系, 吉林 长春 130012)

**摘 要:** 1928 年统一前后, 是民国政治转折的重要关头, 中国的统一面临来自帝国主义势力和军阀主义势力两个方面的挑战。身处其间的关键人物蒋介石在外交上采取措施, 尽量减少北伐统一中帝国主义势力的掣肘, 避开并侧面对抗日本对中国统一的阻挠, 成功并且策略地抵制了日本的侵略。在二次北伐中, 蒋介石消灭北洋政权, 促成东北易帜, 打击了军阀势力, 推进了国家统一的进程; 但在军事善后的过程中, 蒋介石以裁兵削夺异己势力, 使国民党派系矛盾再次激化, 引发新的内战, 统一局面得而复失, 构成严重政治败笔。事实表明, 1928 年统一的成效是有限的。

**关键词:** 蒋介石; 1928 年; 统一; 帝国主义; 军阀主义

**中图分类号:** K26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59-8095(2003)04-0046-09

民国历史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政治分裂, 无论北洋时期, 还是国民党时期, 都没能避免这一消极现象。不过, 在国民革命中北伐胜利进军之际, 曾经出现过结束政治分裂的良机, 给国人昭示了政治统一的前景。在这个政治转折的关头, 把握大局的政治人物在其间有很大的运筹空间, 而蒋介石恰值其位。在 1928 年前后, 有两种政治势力影响着统一的进展: 一是帝国主义列强, 主要是日本, 对中国的统一心怀不轨, 极力干涉中国内政; 二是国内的军阀势力, 仍贪恋军队、地盘, 妨碍统一进程。蒋介石的政治运筹, 在外交上成功地抵制了日本对统一的干涉。但在内政的处理上, 蒋介石急功近利, 忽视了利益调整与政治妥协的重要性, 终导致统一良机丧失, 成为蒋的政治败笔。本文就 1928 年前后蒋介石外交内政活动探讨蒋的政治运筹及其与统一成效的关系, 揭示帝国主义和军阀主义在民国政治转折过程中的作用和影响。

## 一、外交运筹: 从济南事件到东北易帜

近代中国, 列强涉入中国内政甚深, 1928 年统一亦难逃此例。列强 1928 年前后对中国内政的介入, 以制造济南事件和干扰东北易帜两个问题表现最为突出。北伐时期, 国民党的战略是先取得全国的统一, 然后再向列强挑战。<sup>[1]</sup> (P73) 蒋介石在 1927 年下野后, 仍是遵循这一思路来处理对外关系的。他尽力争取的是列强, 尤其是日本对统一的支持, 若达不到此目标, 至少也应是列强对北伐持中立态度。

1927 年秋, 蒋介石赴日本访问, 寻求支持。11 月 5 日, 在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的会谈中, 田中劝蒋经营南方、缓图北伐, 而蒋则表达了对于北伐的决心。<sup>[2]</sup> (P508—509) 话不投机, 会谈无结果而

收稿日期: 2003-03-02

作者简介: 郑率 (1975-), 男, 黑龙江依兰人, 吉林大学文学院历史系讲师, 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

终。蒋介石对此颇为不满，他在会谈当天的日记中写道：“综核今日与田中谈话之结果，可断言其毫无诚意，中日亦决无合作之可能，且知其必不许我革命成功，而其后必将妨碍我革命军北伐之行动，以阻止中国之统一。”<sup>[3]</sup>（第6册，P230）蒋对日本可能进行的干涉忧心忡忡。但是，蒋介石与英国的关系素不相睦，对美国的重要性不甚注意，而且在1927年12月的广州起义后与苏联彻底决裂。日本作为与中国相邻的强国，在华具有其他国家无可比拟的影响力，因此蒋介石在外交上首重日本。

1928年2月8日，国民政府任命与日本素有渊源的黄郛为外交部长。3月6日，蒋介石在南京对日本新闻记者团发表演说时希望日本对于北伐“不特不加阻害，必更进而望其成功，不吝与之声援；更确信日本政府今后亦必不为损人不利己之举，而私衷庆慰者也”。<sup>[4]</sup>（P113-114）不难看出，蒋介石所言隐含对日本干涉的忧虑。4月2日，蒋介石又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名义发表《告友邦人士书》，呼吁：“凡一民族之革命，为一民族自己之事，在理不劳外人越俎过问……我国民革命军所到之地，绝对不致有排外之行动……愿我友邦人士，晓然于接济军阀，即所以延长中国内乱，而妨碍世界之和平，应立即停止其售卖枪械或秘密贷款于军阀之行为也。”<sup>[4]</sup>（P115）18日，国民政府向日本及其他国家驻沪总领事递交了保护外侨的声明。蒋介石希望通过这些表达善意的举措，尽量避免列强特别是日本出兵干涉的可能。但事态的发展击碎了蒋的幻想，隐忧不幸成为现实。4月下旬，日本再次出兵山东，5月1日，北伐军和日军同时开进济南，3日，中日两军发生冲突，日军一手制造了济南事件。

济南事件中日军的举动，大大出乎蒋的意料，他一边与日军作军前交涉，一边致电国民政府报告日军在济南暴行的经过。4日夜，蒋介石在济南总司令部同第一集团军前敌总指挥朱培德、参谋总长杨杰、高级参谋熊式辉等会商，调整军事部署。会议决定退出济南，分五路渡黄河，绕道北伐。当晚，蒋介石密令城外各军渡河北进。<sup>[5]</sup>（P806）对此，日军次日下午发觉，虽然对既渡之军进行袭击，但是为时已晚。日军在山东阻止北伐军的企图落空。

济南事件作为一个转折点，对蒋介石的外交策略产生了重大影响，蒋与美国逐渐靠拢而与日本日趋疏离。

济南事件以前，中美关系在蒋介石的心目中，只居于次要地位。1928年初，中美之间虽就宁案迅速达成协议，但蒋介石对此表现冷淡，无意于继续改善中美关系。<sup>[1]</sup>（P73）济南事件发生后，中日关系恶化，蒋介石才开始重新掂量美国的重要性。中方在济南交涉中的软弱态度，备受各方指责。5月20日，蒋介石密电黄郛：“近日外交紧急，请兄暂时辞职，并望从速。否则，各国外交亦受影响，我军到达京津更难办理也。”<sup>[6]</sup>（P71）可以看出，蒋已不再只专注于日本，而是开始转向“各国外交”。有“亲日”之称的黄郛去职后，由具有美国背景的王正廷继任外长，这表明蒋的注意力已经转向美国，希望能通过美国制衡日本。此后，中美关系迅速升温。在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的反对下，日本直接出兵京津的阴谋破产。<sup>[7]</sup>（P126-127）7月，中美签订了关税新约，美国在列强中第一个承认了国民政府。

与中美的靠拢相反，中日关系迅速降温。从个人角度讲，蒋介石曾留学日本军校，受过严格的日式军事训练，对日本并无恶感。在济南事件前，蒋介石尽力保持中日合作，争取日本的中立态度。济南事件发生后，蒋介石对日本的希望破灭。他指示国民政府将事件大肆曝光，在世人面前揭露日本的侵略面目。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日浪潮。但是，蒋介石并不敢与日本彻底决裂。毕竟美英等国不会为了中国而与日本闹僵，而凭中国自身的力量，根本无力抵抗强大的日本。因此，蒋介石对日本执行了一条妥协路线。同时，蒋介石对日的软弱性格从思想到行动上也有所体现，5月1日，面对气势汹汹的日军，蒋在日记中写道：“不屈何以能伸，不予何以能取，犯而不校，圣贤所尚，小不忍则乱大谋，圣贤所戒。”<sup>[3]</sup>（P26）事件发生后，蒋介石立即下令各师长约束部队，无令不许外出，避免与日军冲突。<sup>[8]</sup>（P166）在交涉的过程中，蒋介石对日的妥协忍让已经尽现人前。然而，日本的纠缠并没有到此为止，北伐的下一步就会接触到日本视为禁脔的东北。

占领京津后，对东北战或和，是摆在国民政府面前的一个重要任务。若武力统一，然奉军此时的实力并未大损，胜负未为可知。同时，出兵关外势将激化中日矛盾，引起日军干涉，前景未可乐观。这是不可轻易而为的下策。若和平统一，借张作霖被暗杀的时机，利导张学良顺应统一的大势，只要

东北赞成统一，服膺中央，即可容许其在或长或短的时间内自成格局，徐图实质性的统一。另外，还可以利用奉军的实力抗衡日本的侵略。客观分析，和乃上策。

日本方面对于中国的统一，除了济南事件中预先有所动作外，这时更进一步采取措施。早在皇姑屯事件发生前的5月末，日本即已由朝鲜调一个旅团到东北，加上关东军原有的第十四师团的所有兵力全部集中奉天业已一月有余，日军在东北已摆开阵势，作出蠢蠢欲动的姿态。张作霖死后，日军企图阻止张学良返奉，张学良化装后方潜回关外。<sup>[9]</sup> (P121-122) 同时，日军在东北一再进行挑衅性的军事演习，制造事端，并在奉军将领中拨弄是非，制造矛盾。<sup>[10]</sup> (P166) 东北局势异常紧张，陷于动荡不安之中。日本的意图是激张学良反抗，借机出兵，或逼张学良就范，服从其意志。同时日本的举动还有威慑国民政府之意。

日本的蛮横凶顽和不可理喻，蒋介石在济南就已领教，况且又有5月18日的警告：“战事进展至京津地方，其祸乱或及满洲之时，我国政府为维持满洲治安起见，或将不得已有采取适当而且有效之措置。”<sup>[4]</sup> (P163) 此时蒋更不敢冒日本出兵的危险，轻易尝试强硬政策。这样，日本的态度便成为影响蒋介石决策的最重要因素。

从6月下旬到7月，田中义一三次下令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警告张学良，宣称，如张“轻与南方妥协，其所造成的影响，日本不能漠不关心”。<sup>[11]</sup> (P408) 8月，日本特派曾任驻华公使的林权助以吊唁张作霖名义来奉天，威逼张学良不要与国民政府接近。<sup>[12]</sup> (第5卷，第32期) 对此，国民政府令驻日公使汪荣宝于7月21日与日本外务省交涉，抗议奉天总领事干涉中国内政的行动。25日，又派王大桢以外交部特派员名义到东京疏通。<sup>[13]</sup> (P239) 9月25日，蒋介石指示张群赴日本与田中说明：日本不要干涉东北易帜之事，先使中国统一，然后解决各案。10月8日，中国方面向日本驻华公使芳泽提出：东北易帜，望日本取中立态度。<sup>[14]</sup> (P50-51) 与此同时，蒋介石还利用美英与日本在华利益上矛盾，推动美英向日本施加压力。8月，美国驻华公使马慕瑞取道沈阳赴朝鲜，杨宇霆曾与之密谈。此举引起日方的注意，林权助为此推迟一日回国。<sup>[13]</sup> (P240) 上述外交活动，对抗衡日本虽然不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但还是在一定程度上为张学良提供了后援。

为给张学良以各方面支持，蒋介石还在国民政府内进行说服工作，达成和平解决东北问题的一致意见，尽全力做争取工作。在蒋介石的耐心努力下，张学良得以专意应付日本不断施加的压力，并不断向国民政府靠拢，易帜只是时间上的问题了。到10月，南北统一问题实际已成定局。

由于蒋张的默契配合，联手对外，加之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久拖不决的东北问题使日本的处境越来越尴尬。面对张学良服从国民政府的既定事实，日本不得不退步，11月，田中无可奈何地承认东北易帜是“中国内政问题”。<sup>[2]</sup> (P891) 在时机成熟的情况下，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旗易帜”。<sup>[2]</sup> (P894) 这样，国民党最终实现了北伐的战略目标，第一次取得了对全国的统治权。东北易帜，有效地打击了日本在东方会议上所确定的侵华政策的推行，田中内阁因此而倒台。这是中国外交的一次胜利，也是国民政府与东北当局合作的结果，它标志着中国统一的重大进展。

可以说，从济南事件到东北易帜，蒋介石对日本干扰中国统一的应对措施基本上是成功的。中国付出了尽可能小的代价，实现了最重要的目标，而日本赤裸裸的帝国主义政策遭到了严重的失败。

## 二、内政运筹：和平统一和军事善后

消灭北洋军阀，夺取全国政权，乃北伐的战略目标，二次北伐即为实现此目标的最后一役。击败奉军本来并非难事，事实上二次北伐中也没有大的战役，但日本在济南的横加阻挠，却打乱了北伐的进程，蒋介石的统一运筹也被迫进行变更。

首先，鉴于北伐继续推进已成为烫手的山芋，蒋介石决定退出北伐的第一线，推冯、阎、李、白诸将上前台而自居幕后操作。交换条件是华北地盘暂时让与非蒋系将领。对奉系，蒋介石表面上下令继续进军。实则暗中与奉系联络，双方代表往来协商。蒋介石为此奔走游说诸将，力劝他们接受政治

解决的主张。在战与和的关头，张作霖出关遇炸的消息传来，南北双方谈判的僵局被打破，奉军火速撤退，北伐军和平接收京津。<sup>[15]</sup> (P709-717) 在此以后，统一由战争轨道转入和平轨道，蒋介石与张学良的合作也逐渐展开。

一方面，蒋介石说服党内主战者，推行和平解决方针。进占京津后，尤其是在蒋、冯、阎、李北平聚会期间，蒋介石积极地劝说北伐诸将采纳其和平统一的主张。在解决东北问题的方式上，蒋介石“曾与主张武力征服东北并废置张学良之李宗仁及广西派发生激烈的争议”，<sup>[16]</sup> (P138) 后来，在奉方代表陈述情况，反复商谈后，李宗仁接受了用政治手段解决东北问题的主张。<sup>[17]</sup> (P291) 另据李宗仁回忆，最初冯玉祥和阎锡山坚决主战，蒋介石亦因此举棋不定，曾托李劝说冯和阎。<sup>[18]</sup> (P409) 虽然李并没有提到劝说的结果，但冯玉祥8月3日在南京曾对记者说：“东省问题在北平已由大家决定，请蒋办理一切，拟将听蒋主持。”<sup>[12]</sup> (第5卷，第31期) 考虑到在东北问题上，北伐诸将此后并未提出异议，可见冯、阎接受了蒋的劝说。南京方面，在蒋介石煞费苦心的努力下，他所主张的和平方案，“经过国民政府热烈讨论后，大多数委员均表赞同”。<sup>[16]</sup> (P138) 最终蒋介石说服了党内主战者，和平主张占了上风。

另一方面，蒋介石因势利导，全力争取张学良服膺国民政府。在日本的威胁下，张学良担心济南事件重演，被迫一再推迟易帜的日期。蒋介石对张学良的处境和行动是持谅解态度的。他在7月15日的日记中写道：“东三省为我国重要国防地带，乃日本势力侵入已入，吾处置方法非慎重周详不可，否则东亚战祸之导火线一旦爆发，将不可收拾矣。总理所以主张和平统一，吾必以至诚力促奉军将领觉悟，欣然来归也。”<sup>[3]</sup> (第7册，P88) 此后，蒋虽屡次催促张学良易帜，但并没有施加更大的压力。双方使轍交驰，联系不断。与此同时，蒋介石还给予张学良诸多优惠待遇。10月8日，蒋在提名张学良为国民政府委员时解释道：“我以为当以力求统一为前提，故对于张学良应予明令发表之，彼或一时不能就职，即准备其不就职可也。且日本阻碍东三省归入中央之阴谋，因此而得以揭穿其真相，于党国方面亦大有益。余之主张如此，请诸同志务以大局为重，慎加考虑。”<sup>[8]</sup> (P88) 经过激烈争论，蒋的提案获得通过。在谈判中，蒋介石向张学良作出了一系列让步：易帜后东北政府机构人员不变；东北派人到南京研究学习党务，然后回东北建立国民党地方组织；热河划归张学良管辖。<sup>[19]</sup> (P46) 这些无疑大大增强了东北的向心力。

将张学良特殊处理的同时，蒋的注意力开始转向手握重兵的北伐诸将。因为到北伐完成时，蒋介石能控制的区域只是东南一隅的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五省，对其它地区则无法有效行使中央权力。这种枝强干弱的形势无异于北洋政府时代军阀割据称雄局面的重演。正如董显光所云：“纵然旧军阀已被推倒，然而，在新的国民党统治下，军阀的不健全复活已成为事实，这是对于新政府的稳定上的继续威胁。”<sup>[16]</sup> (P140)

军队是军阀赖以存在的基础，夺其权必先夺其兵，凭军事起家的蒋介石对这一点是有着深刻认识的。早在二次北伐军中，蒋介石即筹裁兵。<sup>[20]</sup> (P16) 其后，6月24日，蒋介石提议设裁兵委员会，由中央选委重要人员为主任，办理裁兵事宜。<sup>[21]</sup> (P137) 7月5日，蒋介石再次表态。他在复全国经济会议的电报中称：“今日非裁兵无以救国，非武装同志真正觉悟，与全国人士切实合作无以达裁兵之目的。中正谨当与各同志一致努力，决不稍存私意，以负人民责望之殷。”在致各总司令、总指挥的通电中称：“今日非裁兵无以救国，非厉行军政、财政之统一无以裁兵。我同志当以真正之觉悟与全国人民切实合作，以完成此重大之职责。中正尤当竭其棉薄，与我同志共勉之。”<sup>[12]</sup> (第5卷，第26期) 蒋介石对裁兵反复呼吁，可见他对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视的。

蒋介石的裁兵主张与社会舆论是一致的。占领京津后，社会上一般的注意力已从军事转移到国家建设上来，舆论纷纷倡议裁兵，以便国家建设。北伐诸将也不甘人后，6月13日李宗仁、白崇禧，19日阎锡山，7月5日冯玉祥均发表对时局意见，痛陈裁兵必要。全国上下一片团结一致的景象，裁兵声浪高潮迭起。

在这种气氛下，7月3日，蒋介石抵达北平，主持祭告孙中山的典礼，并借机与各方商讨军事善后问题。事前，蒋介石与吴稚晖、宋子文等人秘密策划，精心布置，他们准备了《军事善后案》和

《军事整理案》，由蒋带到北平；同时，召开全国经济会议和全国财政会议，配合蒋的裁兵行动。<sup>[7]</sup> (P178) 6日，蒋、冯、阎、李四总司令在西山碧云寺举行祭灵典礼。在祭文中，蒋介石再次呼吁裁兵：“我总理昔当军阀未除，尚以实行裁兵……值兹更始之际，合国防计划及兵工政策为整个之计议，确定兵额，分别裁留。以裁兵者强兵，且以裁兵促全国庶政入于正轨，此实千载一时之良机也。吾国之苦兵祸久矣，唯贯以革命之精诚，乃可望彻底解决。”<sup>[12]</sup> (第5卷，第27期) 一贯以孙中山继承人自居的蒋介石，在灵前倡议孙中山生前主张的裁兵，为的是更凸显其权威性，这是蒋介石摆出的高姿态。

面对蒋介石一再鼓吹的裁兵论调，冯玉祥、阎锡山和桂系这些政坛老手自然明白其削夺异己兵权的用意。他们对蒋的作法都有思想准备。阎锡山在北伐中得利最多，他力图保住既得权益，避免与蒋正面冲突。桂系抱怨地盘太小，没有出海口，但因其北方根基不稳，所以暂时隐忍。冯玉祥因没有得到梦寐以求的京津地区，心怀怨愤，他自恃北伐功高，实力雄厚，遂决心与蒋一争高下。在裁兵问题上，他与蒋的对立最为突出。

在全国上下高唱入云的裁兵呼声中，舆论持乐观态度：“各方一致之主张，为缩军队，行兵工，而财政统一于中央，所须论者，其具体的方法而已。”<sup>[37]</sup> 然而，一旦涉及到“具体的方法”，分歧便暴露出来。蒋介石祭灵完毕提出的裁兵方案未获通过，冯玉祥通电公开提出有利于自己的新裁兵标准。7月8日下午，在阎锡山邀请国民党要员参加的宴会上，冯玉祥对蒋的抵触情绪更加明显。蒋介石发表演说，称：北伐告成，诸同志欢聚一堂，无任欢慰。冯则表示：“不平等条约尚未废除，旧军阀残余尚未完全消灭，各军裁兵未见实行，余不胜悲痛。”<sup>[5]</sup> (P844) 言语之间，隐露锋芒。

面对各实力派，尤其是冯玉祥的反对，蒋介石决定从长计议，于是遂有7月11日的汤山会议。汤山会议亦采用谈话会方式，经过两天讨论，吸纳各派意见，13日，蒋介石公布了《军事整理案》，主要内容有：1、由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各集团军总司令、海军总司令和参谋总长，另加三人或五人，合组国民革命军编遣委员会，直隶国民政府，各军均听委员会编遣。编遣委员会成立后，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各集团军总司令和海军总司令一律取消。2、择各军精锐而曾立战功者，统辖于中央，编成五十至六十个师。3、全国军队统一编制，轮番易教。各军军官分批调入中央军校训练，或派往国外学习。全国设置几大练兵场，各师编成后，分期调集训练。<sup>[12]</sup> (第5卷，第28期) 这个计划归纳一下，无非四个字：权归中央，这与各界的呼吁也是一致的。

此项议案，与各派公开做的官样文章似乎一致，然而精明的冯、阎、李诸人早已窥破蒋同化异己的企图，虽均表同意，但“此案对中央，只为一建议性质，采否之权，须俟五次全会时提出”，<sup>[12]</sup> (第5卷，第28期) 因此这种赞同并不可靠。最后，蒋在离开北平前，邀请众人到南京参加二届五中全会和编遣会议，继续讨论裁兵问题。<sup>[7]</sup> (P169) 蒋介石裁兵之意已决，不肯因各派的消极态度而放弃。

北平聚会，蒋介石投石问路，试探出各方对裁兵的态度，并商定了《军事整理案》，这是蒋此行的成果。但是，更重要、更本质的问题在于，北平聚会是在北伐基本成功的前提下，各方商讨军事善后，进而重新分配权力的一次尝试。各方虽已产生龃龉，然而在统一的大气候下均未撕破面皮，但分裂的危机已经潜伏，若处置不当，矛盾势要加深。北平之行，蒋介石锐意统一的雄心并未因地方实力派的暗中反对而稍减。由平返京路上，蒋介石在蚌埠召集嫡系军官训话，称：“旧的军阀固然是打倒了，但是新的军阀却又产生了。我们要完成国民革命，非将新军阀一齐打倒不可”。<sup>[18]</sup> (P417)

蒋介石回到南京后，采纳了幕僚杨永泰提出的“削藩策”。杨永泰建议：欲削夺各实力派的兵权，首先需要取消各地的政治分会，由中央行使一切权力。第一步，把各实力派的首领调入中央任职，同时取消各地的政治分会；第二步，统一整编全国军队，遣散各实力派赖以活动的资本。<sup>[7]</sup> (P171) 具体策略为：“以经济方法瓦解二集；以政治方法解决三集；以军事方法解决四集；以外交方法对付奉张。”<sup>[22]</sup> (P321) 蒋介石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已经确定了对付各地方实力派的方针，准备借二届五中全会和国民政府改组之机付诸实行。不过，蒋介石实行削藩遭到了诸将的消极抵制。

8月8日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上，蒋介石提出政治分会易导致地方割据，极力主张取消政治分会。但党内李石曾、张静江等元老认为孙中山遗教规定中央与地方均权，主张暂时保留。<sup>[18]</sup>

(P417) 而冯玉祥、李宗仁则找出两条反对的理由：1、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已经作出决定，政治分会应当保留到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时，现在取消，违反四中全会决议。2、中央决定各地分区“剿共”，若取消政治分会，就会削弱“剿共”的力量。<sup>[7]</sup> (P172) 对于两方面的理由，蒋介石无法反驳。恰逢此时，因病未赴会的阎锡山又在太原宣誓就任太原政治分会主席。显然，阎此举是在向蒋示威。在各方面的压力下，蒋介石只好让步。14日，会议通过《政治分会存废案》，规定各地政治分会到年底一律取消（后因国民党三中全会延期，政治分会于次年3月方取消），但同时政治分会的权力作出限制。<sup>[23]</sup> (P544) 在政治分会问题上，蒋介石未能达到目的。

关于裁兵问题，蒋介石、何应钦联名提出了以汤山会议《军事整理案》为底本的《整理军事案》，由于粤派委员的支持，提案获得通过。《整理军事案》中规定了五项原则：1、军令、政令必须绝对统一。2、全国军队数量必须在最短期间内切实收缩，军费在整个预算上不得超过百分之五十。3、军事教育统一。各军、各地方不得自设军官学校，一切军事教育归中央。4、裁兵为整军理财之第一要务，化兵为工，移兵垦殖，实行良政；裁兵计划必须与此原则相结合。5、发展海军、空军及军港要塞之设施。<sup>[23]</sup> (P538-539)

这样，蒋介石的裁兵计划正式成为国民党中央的决议，削藩也就有了依据。这是蒋介石在会议上关于军事善后问题取得的进一步成果。然而，会后诸将对中央任命的官职托辞不就，防备蒋介石调虎离山，不合作的姿态愈为鲜明。对此，蒋介石亦以行动表明裁兵的决心。10月2日，国民政府决定取消各集团军名号，并通过各师师长任命案。<sup>[5]</sup> (P887) 11月7日，国民政府明令裁撤军事委员会，该委员会所管理的一切事宜分别移交军政部、参谋部、军事参议院和训练总监部办理。<sup>[5]</sup> (P907) 12月11日，国民政府特派何应钦为编遣委员会筹备主任，筹备组织全国编遣委员会。<sup>[5]</sup> (P926) 19日，中央政治会议通过了《全国编遣会议组织条例》，规定了编遣会议的职权范围。<sup>[5]</sup> (P931) 与此同时，蒋介石提早邀请各实力派来京参加编遣会议；并制造舆论，鼓吹编遣会议的重要性，给各实力派施加压力。<sup>[12]</sup> (第5卷，第50期)

冯玉祥自恃实力可以与蒋一争，10月13日便到达南京，而阎锡山和李宗仁硬着头皮分别于12月13日和23日到达，李济深则迟至1929年1月6日方抵京。经过几个回合的较量，蒋介石与地方实力集团的矛盾已经越来越深。现在各路诸侯齐聚首都，削藩与反削藩斗争最后摊牌的时刻来到，编遣会议就成为由和平削藩到武力统一的转折点。

北伐结束后的几个月里，军事善后工作的进行非常不顺利。蒋介石落实削藩策的努力遇到重重阻碍，无论政治削藩还是军事削藩，都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到年底，蒋介石在东北问题解决，中央大权在握的情况下，把工作的重心转向编遣会议。

12月26日，编遣会议预备会议在南京召开。会上，蒋介石摆出超然姿态，施展以派制派的手段。在蒋的敦请下，冯玉祥提出了自己的编遣方案：第一、第二集团军各编十二个师；第三、第四集团军各编八个师；其它军队编八个师。<sup>[24]</sup> (P126-127) 冯意图拉平一、二集团军，压制三、四集团军。对此，桂系和阎锡山暗中颇有微词，蒋则未置可否。<sup>[24]</sup> (P126-127) 在讨论冯案的同时，蒋介石又暗中派人疏通阎锡山，希望阎提出于己有利的方案。圆滑的阎锡山在斟酌之后，提出了一个既反映蒋的意见，又不触怒冯玉祥和桂系的方案：一、二集团军各编十个师；三、四集团军各编八个师；其它军队编六到八个师；另有六到八个师由中央处理。<sup>[24]</sup> (P128) 此案颇合蒋介石的口味，也与蒋的意图接近，蒋表示赞许。

1929年1月1日，编遣会议正式开幕。当日，蒋介石以国民政府主席身份，发表了《关于国军编遣委员会之希望》一文。他以日本明治维新过程中诸藩归政、改革军制的经过，以及美、德两国统一军权、财权组成联邦政府，完成国家统一的事实为例，说明军事、财政统一的重要性，希望各军事领袖站在中央立场，以国家为重，协助政府完成编遣工作。<sup>[25]</sup> (P4841-4853) 然而，这些冠冕堂皇的话对惟恐丧失权力的各路诸侯是不能产生丝毫效果的。从1月5日到25日，编遣会议共召开了六次大会，由于各派目标不同，于蒋为削弱异己，于冯为与蒋平起平坐，于阎、桂则为各派平衡，因此在整个会议期间争议不断。会议通过了《国军编遣委员会进行程序大纲》，这是编遣工作进行的依据，也是国

民政府整理军事的基本纲领。按《大纲》规定，关于军队的控制，把军官任命、军事教育和军队调遣的权力全部收归中央，地方将失去对军队的控制；关于编遣区的设置，采纳阎案并增加一个东北编遣区，蒋介石可以控制中央、海军、第一和第六四个编遣区，冯玉祥、阎锡山、桂系和东北则只能各控制一个编遣区，而且中央还可以派员参加各区的编遣工作，在将来军事实力的保存上，蒋明显占优。<sup>[25]</sup> (P4888 - 4892)

蒋介石利用各派系的矛盾，实现了自己的意图，但打击冯玉祥的结果，使蒋冯关系走向破裂，而蒋的优势地位又使阎、桂两派深感不安。各派系与蒋介石的矛盾激化。冯玉祥因自己的提案被否决，一怒之下，称病拒会；<sup>[24]</sup> (P129) 阎锡山急着要返回山西；<sup>[18]</sup> (P413) 白崇禧则在会外提出军队实边的建议，以此为名抗拒裁兵。<sup>[26]</sup> (P71 - 73) 在会议最后阶段，各派首领均沉默不语，会议陷入僵局。蒋介石见会议无法继续进行，只好宣布休会，以后再召开编遣实施会议。1月26日，会议不欢而散。

编遣会议结束后，在各地地方实力集团中，除张学良与蒋保持合作以外，冯玉祥、阎锡山和桂系因利害攸关，逐渐靠拢，抗拒编遣。冯、阎、李等人纷纷驰回驻地，秣马厉兵，准备新的较量。蒋介石对此很清楚：“各省分离分子所控制的军队多抗不奉命，仍为新政府未能解决问题。”<sup>[16]</sup> (P16)

“编遣会议，总之是一大失败。”<sup>[27]</sup> (P261) 蒋介石杯酒释兵权的企图落空，其与各地方实力派的矛盾迅速激化。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谈判桌上解决不了的问题，只好付诸战场。蒋介石实施削藩的结果，就是内战的重新爆发。事后有人评论道：“编遣会议筹备期间，已多扞隔，开会之后，益觉化离，不特蒋桂之战，与有关联，即蒋冯之争，亦种因于此。”<sup>[28]</sup> (P42) 3月，蒋桂交兵后，连年的内战由此展开，国家又陷入兵戈扰攘之中。刚刚开始统一局面付之东流。

综合分析，在北伐最后阶段，蒋介石能够综合内外形势，向诸将让权并对奉系格外优待，有力地保证了北伐功业的圆满，促进了统一的进程。然而，随着北伐的成功，诸侯割据局面与蒋介石独揽大权的意愿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明显。蒋介石当时在国民党内并不是一位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人物。而且，历来战事之后，善后为一大难题。再者，从晚清到民国的地方主义、军阀主义，已成积弊，非短时间能根除。蒋介石借善后之名大刀阔斧地推行削藩策，试图从根本上摧毁军阀政治的权力基础，这在曾经和蒋并肩北伐的诸将看来，无异于兔死狗烹，铲除异己。因此，他们不会服从蒋的意志，坐以待毙。他们凭借手中的地盘、军队走上了与蒋争雄的道路。在军事善后的过程中，蒋介石热衷集权而忽视了权力的平衡，急切地希望在短期完成实质性的统一，结果事与愿违，欲速不达，一场大规模的内战由削藩而引发。蒋介石的权位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中国也重新陷入分裂的局面并严重影响了此后国民党的凝聚力。因此，军事善后处理不当乃蒋介石政治生涯中的一个严重败笔。

### 三、帝国主义和军阀主义因素对蒋介石政治运筹的影响

1928年中国的统一，不但是政权更迭的过程，而且是有着深层次背景的利益重新调整，是权力再次分配的政治大调整。帝国主义和军阀主义是当时左右中国政局的两大势力，统一的成功与失败，皆与此二者密切相关，而且内政外交又互相牵扯。作为统一过程中的关键人物，蒋介石势必与帝国主义和军阀主义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蒋在1928年统一过程中的活动正是外交和内政两方面反映出这种联系。

从外部因素看，在半殖民地的社会环境下，列强无时无刻不在介入中国的内部事务，但自国民革命兴起以来，列强在中国政治结构中的地位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北伐开始以后，列强意识到其在华权益的危险处境，纷纷改弦易辙，调整对华政策。但在瞬息万变的中国政局中，列强各有自己的判断，彼此之间形成了相互竞争的关系，对华政策的歧异便由此产生。总的看来，美英等国对华关系呈缓和之势，而日本对中国的政策则日趋强硬。

作为北伐决策人的蒋介石，经历了对外态度的巨大转变。北伐前期，蒋介石的“革命外交”主张和行动，使列强视其为持民族主义观点的强硬派。直到1928年初国民党的二届四中全会，蒋介石的对外态度方发生微妙变化。<sup>[29]</sup> (P171 - 172) 这反映了国民党从革命党到执政党角色转换后，外交行为

逐渐走向常规。

济南事件中，与日本冲突的切肤之痛，使蒋介石对帝国主义从理念到实践上的软化，“忍辱负重”实际上反映了蒋激烈复杂的心理转变。5月9日，蒋在日记中写道：“如有一毫人心，其能忘此耻辱乎？忘之乎？雪之乎？何以雪之？在自强而已！”“有雪耻之志，而不能暂时容忍者，是匹夫之勇也，必不能达成雪耻之任务。余今且暂忍为人所不能忍耳。”<sup>[3]</sup>（第7册，P51）其心迹于日记中可略见一斑。在东北问题上，蒋未与日本作正面的对抗，而只是从侧面进攻，即是其对外政策转变的明证。从蒋氏的心路历程中，我们可以体味到半殖民地条件下弱国外交的心理逻辑。

北伐结束后，列强尤其是日本在中国政治中的影响并没有多少减弱，抵御外敌依然是一个重大的任务。对此，蒋介石深有感触地指出：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是外交，若不能打破外交难关，打倒军阀的目标就无法达到。<sup>[30]</sup>（P4127）日本在1928年统一过程中的干涉，不但使蒋介石改变了对外态度，而且也影响到了统一的成效。

从内部因素看，在1928年统一的过程中，北洋时代的军阀主义继续存在，而国民党以党治国的理念还没有切实付诸实行，北伐的成功，当时就被讥为“军事北伐，政治南伐”，而北伐诸将则被称为“新军阀”。美国学者谢里登认为：“北伐并没有消除军阀，它只是把他们纳入国民党之内。不仅主要的军阀，诸如冯玉祥和阎锡山，转变为国民政府表面上的柱石，而且数十位次要的军阀也参加了军事行动，这些人军队的联系以及态度和目的则基本上没有改变。……吸收军阀的结果是军人变得不再那么忠于国民党最初的目标和原则，国民党的实权便转入军人手里。”<sup>[31]</sup>（P240）事实的确是如此，除了换上国民党和三民主义的招牌外，所谓“国民党地方实力派”与北洋军阀的行事几无差别。而纵观蒋介石的所作所为，亦充溢着浓厚的军事色彩，其对军权的重视，在政治生活中的不讲原则，斗争手段的毒辣，不逊于任何军阀，故对蒋也有“新军阀”之称。

其实，如上所论的蒋介石集军阀特征与反军阀特征矛盾于一身，正是历史过渡时期的特殊现象，也是历史发展中并不罕见的悖论现象。北伐成功后的军权问题是矛盾的焦点，在当时情况下，恐怕系铃解铃都离不开军人，其关键在于如何尽量化解矛盾，逐步实现国家统一，而不是一味用武力解决。

1928年中国的统一，结束了民国初年形成的南北分裂局面。作为统一过程中关键人物的蒋介石，在外交上采取措施，尽量减少北伐统一中帝国主义势力的掣肘，避开并侧面对抗日本对中国统一的阻挠。总体上看，1928年前后蒋介石为国家统一所做的外交努力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基本上是成功的。

在二次北伐中，蒋介石消灭北洋政权，促成东北易帜，打击了军阀势力，推进了国家统一的进程。不过，在军事善后的过程中，蒋介石借裁兵为名，削夺异己势力，使本已存在的国民党派系矛盾再次激化，酿成一场新的内战，统一局面得而复失。这昭示了国民党、蒋介石未能彻底地脱离北洋时期军阀主义的窠臼，中国也未能就此走上团结统一的道路。

1928年统一流产的后果是严重的，良机一失，再寻不易，直到抗战前，蒋介石所追求的政治统一进展有限。纵观国民党22年的大陆统治时期，帝国主义势力和军阀主义势力一直是摆脱不掉的魔影，中国未能实现真正、彻底的政治统一。

#### 参考文献：

- [1] 罗志田. 济南事件与中美关系的转折 [J]. 历史研究, 1996, (2).
- [2] 章伯锋. 北洋军阀: 第5卷 [Z]. 武汉: 武汉出版社, 1990年.
- [3] [日] 古屋奎二. 蒋总统秘录 [Z]. 台北: 中央日报社, 1976.
- [4] 秦孝仪.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 [Z]. 台北: 中央文物供应社, 1981.
- [5] 李新. 中华民国大事记: 第2册 [Z].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7.
- [6] 蒋介石抵制胡汉民孙科在欧活动函电选 [Z]. 历史档案, 1984年, (2).
- [7] 张同新. 国民党新军阀混战战略 [M].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2.
- [8] 李勇, 张仲田. 蒋介石年谱 [Z].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5年.
- [9] 崔成义. 张学良奔丧见闻 [Z]. 文史资料选辑: 第52辑 [Z].

- [10] 史全生, 高维良, 朱剑. 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 [M]. 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7.
- [11] 东亚同文会. 对华回忆录 [Z].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59.
- [12] 国闻周报 [Z].
- [13] 陶菊隐.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第 8 册 [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59.
- [14] 马越山. 九·一八事变实录 [M].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1.
- [15] 杨天石. 中华民国史: 第 2 编, 第 5 卷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6.
- [16] 董显光. 蒋总统传: 上册 [M]. 台北: 中华文化出版事业社, 1960 年.
- [17] 张友坤, 钱进. 张学良年谱: 上册 [Z].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6.
- [18] 李宗仁. 李宗仁回忆录 [Z].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8.
- [19] [美] 傅虹霖. 张学良的政治生涯 [M]. 沈阳: 辽宁大学出版社, 1988.
- [20] 陈布雷等. 蒋介石先生年表 [Z]. 台北: 传记文学出版社, 1978.
- [21] 杨树标. 蒋介石传 [M]. 北京: 团结出版社, 1989.
- [22] 简又文. 冯玉祥传: 下册 [M]. 台北: 传记文学出版社, 1982.
- [23] 荣孟源.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 (上) [Z].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1985.
- [24] 周珉. 回忆编遣会议 [A]. 文史资料选辑: 第 52 辑 [C].
- [25] 革命文献: 第 24 辑 [Z]. 台北: 中央文物供应社, 1960.
- [26] 白崇禧. 白崇禧回忆录 [Z].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1987.
- [27] 黎东方. 蒋介石序传 [M]. 台北: 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76.
- [28] 刘治平. 反蒋运动史 [M]. 中国青年军人社, 1934.
- [29] 罗志田. 北阀前期美国政府对华革命的认知与对策 [J]. 中国社会科学, 1997, (6).
- [30] 革命文献: 第 21 辑 [Z]. 台北: 中央文物供应社, 1984.
- [31] James E. Sheridan. *Chinese Warlord—the Career of Feng Yu - hsiang* [M].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责任编辑: 李洪权

(上接第 45 页) 由守旧走向趋新, 各代群之间既有思想上的继承性, 也有思想上的创新性, 从而推动了近代思想的进步和发展。研究、比较不同群体在巨变时代条件下的思想差异并探讨形成这种差异的深层原因, 代际理论自有其有效性。

#### 参考文献:

- [1] 玛格丽特·米德. 代沟 [M].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1988.
- [2] 梁启超. 饮冰室合集: 文集第 9 [Z].
- [3] 梁启超. 饮冰室合集: 专集第 4 [Z].
- [4] 梁启超. 饮冰室合集: 文集第 39 [Z].
- [5] 钟叔和. 曾国藩家书 [Z]. 长沙: 湖南大学出版社, 1989.
- [6] 曾国藩. 禀父母 [A]. 曾国藩全集: 家书 [Z]. 长沙: 岳麓书社, 1994.
- [7] 湘乡曾氏文献: 十 [Z].
- [8] 曾纪泽遗集 [Z]. 长沙: 岳麓书社, 1983.
- [9] 梁启超. 清代学术概论 [Z].
- [10] 丁文江, 赵丰田. 梁启超年谱长编 [Z].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3.
- [11] 汤志钧. 康有为与保皇会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责任编辑: 吴 彤